

“左右逢源”何以可行：中等强国在俄乌冲突中的对外政策选择*

张一飞 甄 选

【内容提要】 在俄乌冲突中，部分中等强国需要在维系与俄罗斯能源合作的前提下，继续维系与美国或欧洲的安全与战略关系。面对这一选择困境，它们拥有三种政策选择：一是随波逐流，消极敷衍。既顺从美欧引领、制造的集体压力，又顺从与俄罗斯能源合作的现状，且不对双方采取安抚措施。二是追随一方，另保核心。在政治上强烈谴责俄罗斯，在经济上全面参与制裁俄罗斯，但在核心领域延续与俄罗斯的合作。三是局内偏私，局外弥补。宣布对冲突保持中立，在为俄罗斯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同时，在美国和欧洲的其他重要战略关注上大力提供帮助。从实践经验来看，奥地利努力维持冲突前与西方的政治关系及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日本在认知域与物理域均“站队”西方，但同时以相对的隐蔽方式维持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印度则致力于用“中美竞争中助美”交易“俄乌冲突中助俄”。中短期内，它们均以较低成本在对外关系中维护了本国核心利益。从长期来看，这些中等强国的政策选择可能导致其内部利益集团分化，外部信任危机加剧；造成冲突双方的大国可能“决斗”倾向上升；增加劝和促谈难度；但同时，也使得全球互联“火种”存续，并在危机背后催生新的机遇。

【关键词】 俄乌冲突 中等强国 对外政策 奥地利 日本 印度

【作者简介】 张一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甄选，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国家高端智库副研究员。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美国意识形态与认知战研究”（23ZKJC122）阶段性成果。

引言：中等强国的选择困境

在一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国际军事冲突中，根据参与程度，所有国家可被分为三类：一是战斗发生国，即引爆、延续和终止冲突的国家，它们是冲突的核心，从根本上决定着冲突的性质和结果；二是影响施加国，即以非军事方式影响冲突进程的国家，它们不会派遣武装人员直接参与战斗，但却在物理域或认知域通过援助、制裁、宣传、劝和等具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战场走向；三是矛盾规避国，即被动承受冲突影响且缺少影响冲突进程能力或意愿的国家，它们远离战场，在国际事务中尽量与冲突要素保持距离，仅致力于维护本国和本地区的正常运行。其中，在战斗发生国之外，大国通常是主动的影响施加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冲突的演变轨迹；小国通常是被动的矛盾规避国，缺少足够的杠杆左右冲突双方，也没有规范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更多关注如何应对冲突影响。但对于中等强国而言，它们既非无足轻重，也非至关重要，一方面，它们的立场和政策既会以量变的方式影响冲突双方战略天平的升降，另一方面，它们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突结果所释放的结构性压力的承受者。对中等强国政策取向与变化势能的学术考察是国际战略研究主题的应有之义。

（一）关于中等强国的研究现状

学术界关于中等强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中等强国的界定标准。爱德华·乔丹从国家偏好角度提出，中等强国是那些实力、能力和影响力不大不小，且具有增进世界体系团结和稳定取向的国家^①。刘乐从规模和实力角度提出，“中等国家（Middle Power）是指实力介于大国（Great Power）和小国（Small Power）之间，具有中等力量和规模的国家。它们虽没有显著的权势和地位，但也不至于脆弱到无以自保和难有作为”^②。魏光启则认为，中等强国的基

^① Eduard Jordaan, “The Concept of a Middl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merging and Traditional Middle Power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Vol. 30, No. 1, 2003, p. 165.

^② 刘乐：《左右逢源还是进退两难：朴槿惠时期的韩国在中美间的两端外交》，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

本特征包括“物质资源弱于超级大国或大国；具有良好的全球公民形象；借助国际组织和机构开展工作；居间调停，和平解决冲突；参与维和行动等”^①。

二是中等强国的功能潜力。安德鲁·库珀与莫琼林认为，中等强国结成 G20 等集团之后，有一定的潜力与大国分享世界领导权。但是，中美等大国的巨大影响力和机制外小国对中等强国国际机制话语权的侵蚀也会降低中等强国的国际地位^②。马克·比森认为，国际体系复杂多变，传统大国格局中层出不穷且长期无解的政治经济问题正在呼唤“中等强国时代”的到来^③。凌胜利则指出，如韩国等中等强国的外部功能有可能受到来自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国际政治格局演变以及国内政治变动等因素的制约^④。

三是中等强国的策略空间。大卫·莫里斯认为，在两极或多极格局中，在全球和地区的范围内，中等强国均可以通过与威胁施加国的对手结盟保全自身生存^⑤。张耀提出，“在显性对冲战略中，中等强国有足够的战略选择空间来应对体系压力，通过彰显中立性来避免承担‘一边倒’的风险，其主要制度方略是排斥针对目标国的排他性安全制度、欢迎竞争性大国发起的经济合作框架和通过包容性的多边制度纳入大国竞争”^⑥。刘丰、陈志瑞则认为，“在地区内崛起国与其他大国处于弱对抗态势的情况下，中小国家并没有面临明确的选边站队压力；而同时追求自主性、安全和福利三项战略目标，也使得它们倾向于在多方力量之间维持平衡”^⑦。

综合而言，对中等强国的最大共识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规模和实力居于地区一流、全球二流但未落三流；二是偏好以多边主义和战略平衡维持稳定和

① 魏光启：《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载《太平洋学报》2010 年第 12 期。

② Andrew Copper, Jongryn Mo, “Middle Power Leadership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G20”, *Global Summitry Journal*, Vol. 1, Issue. 1, 2013, p. 11.

③ Mark Beeson, “Can Australia Save the World?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Middle Power Diploma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5, No. 5, 2011, p. 563.

④ 凌胜利：《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效果为何有限？》，载《太平洋学报》2016 年第 2 期。

⑤ David Mares, “Middle Power under Regional Hegemony: To Challenge or Acquiesce in Hegemonic Enforce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1988, p. 457.

⑥ 张耀：《中美战略竞争与亚太中等强国的行为选择——以美国“印太战略”升级为契机》，载《东南亚研究》2023 年第 2 期。

⑦ 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载《当代亚太》2015 年第 4 期。

发展。两者在政策过程和结果层面交汇，便有助于从国家能力的角度提出新的定义思路——有一定的实力和能力，便拥有自主的策略空间；有多边主义和战略平衡等偏好，便拥有明确的政策倾向。因此，本文将中等强国定义为，综合国力与战略能力的影响范围主要集中于本地区，且有能力通过多种方式在与全球性大国的博弈中较为完整地维护本国主权安全、经济发展等核心利益的主权国家。

（二）俄乌冲突中的外围国家

俄乌冲突爆发后，作为大国的美国以具有破坏性的方式影响着冲突进程。美国没有直接出兵支援乌克兰，但以四种方式深度干预了冲突进程：一是发起、领导西方国家对俄经济制裁^①；二是给予乌克兰大量军事援助^②；三是在舆论上极力恶化俄罗斯形象；四是在外交上发动、协调对俄孤立。

小国群体普遍持矛盾规避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对俄乌冲突的性质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表态，更没有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冲突解决方案或政治号召。它们不赞成以武力改变国家间疆界，但在对俄关系方面又较具包容性，反对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简单等同于惩罚俄罗斯。相较于评判是非，它们更关心“共同复苏、强劲复苏”^③。二是在客观上没有给参战双方提供具有重大影响的帮助或制造具有战略意义的障碍。在冲突没有对本国基本价值观和安全利益造成重大消极影响的前提下，它们更倾向于与俄乌冲突的正面战场保持物理和物质层面的安全距离。

相较上述积极主动与消极被动的两类群体，在俄乌冲突中，中等强国群体因其实力地位和策略空间呈现出三大特点：第一，它们无法从根本上左右冲突进程，但对冲突双方的外交环境优劣有着重大影响；第二，它们是冲突双方努力争取乃至控制的对象；第三，受国家战略或安全关系限制，它们在政治立场上普遍与美国、欧洲、乌克兰保持一致，至少没有完全与俄罗斯保持一致，但在现实利益上却无法迅速摆脱对俄罗斯的深度依赖。

^① 李建民：《俄乌冲突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的影响、应对及启示》，http://ipd.cssn.cn/xscg/xslw/202206/t20220630_5414817.shtml，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② Jonathan Masters, Will Merrow, “How Much Aid Has the US Sent Ukraine? Here Are Six Charts”, <https://www.cfr.org/article/how-much-aid-has-us-sent-ukraine-here-are-six-charts>，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③ 肖河：《发展中国家视野中的俄乌冲突》，载《光明日报》2023年2月28日。

（三）俄乌冲突中中等强国的政策困境

相较之下，只有中等强国在俄乌冲突中存在对外政策的选择困境。

第一，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面对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各方矛盾的激化，它们不得不表达立场，并在不同程度上调整对外政策。俄乌冲突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冲突，正在推动国际战略力量和格局进行深度调整^①，且有可能比所有国家的预期时长延续更久。对冲突的立场和政策成为中等强国与冲突相关各方政治、经济交往中无法回避的要素。

第二，中等强国对冲突双方中的主要大国均存在战略、安全或经济上的深度依赖关系，且实力和能力不足以完全抵制大国裹挟或消除未来与一方大国的关系隐患，因此无法在不损失任何声望或利益的情况下作出选择。地缘冲突促使国际关系阵营化加深，而中等强国又恰恰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边主义的最大受益者。它们的传统政策路径依赖被打破，但新的路径选择却缺少依据和动力。原因之一是时至今日俄乌冲突仍然没有一方获得压倒性优势；之二是冲突双方考虑到既得外交或经济利益，都暂时没有对各方施加过大压力，避免将第三方国家推向对立面。

第三，由于美国、欧洲、乌克兰一方与俄罗斯一方均已骑虎难下，冲突性质正在从得失战向生死战转变，中等强国很难通过一般的对冲战略降低损失和风险。“对冲战略是一种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的战略组合，其目的是通过一组相互对立的政策选择，抵消结构变迁带来的风险，从而为行为体的长期利益起到保险作用：它既为有利的情况留下空间，也为不利情况的发生做足准备。”^② 在俄乌冲突中，对俄罗斯而言，所有参与对俄政治、军事、经济围攻的国家均系敌对力量；对美国而言，避免多年投入沦为沉没成本，通过暴力手段将俄罗斯逐出大国行列等战略诱惑足以使其在本阶段忽略次等收益和其他“表面文章”。因此，即使中等强国向受损方穷尽解释说明，降低与受益方合作水平，在其他议题上对受损方作出重大让步，也很难获得谅解或者在战后完全化解信任危机与未来隔阂。对中等强国而言，以追随一方的收益弥补失去一方的损失，或两边下注、风险对

^① 高云：《冲突影响不断外溢，激发各方持续反思——俄乌冲突一周年回望》，载《解放军报》2023年2月23日。

^② 刘乐：《左右逢源还是进退两难：朴槿惠时期的韩国在中美间的两端外交》，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

冲，在冲突性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并不成立。

一言以蔽之，在俄乌冲突中，中等强国往往不得不在俄乌双方中作出立场和政策选择，却又缺少明确、线性的选择依据。它们的对外政策有何运行思路？具有代表性的中等强国在对外政策选择中如何体现这些思路？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有可能给各方以及全球造成哪些影响？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一 中等强国的政策选择

能源安全关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计民生与社会正常运行，对生产生活具有较强的粘合度，而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出口地位在短期内难以被其他国家以较为廉价的方式替代。因此，对中等强国而言，至少在中短期内，与俄罗斯的能源关系相较于与美欧的安全关系更为直接、紧迫。在俄罗斯陷入冲突的背景下，中等强国必须“活在当下”，权且稳住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即使要在未来作出对俄罗斯不利的政策调整，数年之内也不能轻易主动放弃对俄合作。但从长远来看，它们与美国或欧洲的安全关系与战略合作同样不可或缺。在此背景下，现阶段中等强国的双向选择困境实质上已被转化为在维系与俄罗斯能源合作的前提下，采取何种政策继续维系与美国或欧洲的安全与战略关系。

（一）随波逐流，消极敷衍

中等强国调整力度最小的对外政策是继续按照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的方式分别与两大阵营进行政治经济互动。具体表现包括：第一，顺从美欧引领、制造的集体压力，在政治上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避免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道义”指责。第二，顺从与俄罗斯能源合作的现状，并在经济上明显表现出消极制裁甚至客观上阻碍制裁俄罗斯的政策倾向。第三，对于对外政策给双方造成的不满，不作“解释无奈之处”“减弱政策效果”或“让与其他利好”等安抚措施。需要强调的是，此种政策不可被视为“骑墙政策”。后者通常会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动态调整与冲突双方的外交距离以及合作内容，并会为与距离较远一方维持关系以及未来外交关系的转变做好预案、留足空间；而此种政策则恰恰受限于既定政治经济格局，缺少灵活调整空间。

此种政策的可行性基础有三：一是中等强国具备一定的实力地位，可以维持

基本的决策自主。表面上看，这种左右逢源之举反映出中等强国在大国夹缝中的无可奈何，但它却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此类国家具备“自相矛盾”的能力，而非被“先下手为强”的大国裹挟，完全倒向一方。二是冲突双方在正面战场陷入僵局、战略格局基本均衡之际，不愿过多树敌。只要此类国家仍然顾及与各方阵营的核心关系，就不至于对双方的战略全局起到颠覆性破坏作用，美欧与俄罗斯则均要避免“化友为敌”甚至在阵营内部或其他方向另辟战线的风险。三是战略惰性符合人性弱点，随波逐流必然是大多数国家的本能选择。所谓“法不责众”，与大多数国家保持一致的政策倾向最有利于形成和维持安全感。

此种政策可以使冲突中的大国一时间不至于向中等强国过分施压或惩罚报复，但是其隐形代价却客观存在。一是政策取向的矛盾之处过于明显，容易引发国内思想混乱。由于安全感稀缺，人们本能地更多关注风险而非收益，不同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可能担心本国被某一方绑架，进而失去与另一方的关系红利，并因此向决策集团施压。而这种压力可能更加坚定而非动摇决策集团对双方固有关系的路径依赖。因此，对风险和收益的认知错位容易形成恶性螺旋，增加国家内耗。二是国家外部环境中的长期风险增加。同样由于安全感不足，大国本能地更多关注意明确的敌对要素而非显性的合作要素，在危机状态下针对本国采取政治对立或经济掣肘措施的国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不可信任。在未来的某些契机之下，俄乌冲突中此类中等强国的“欠佳”表现可能会影响更长时间内大国对与其双边关系的决策与政策，从这一角度讲，大国对其施加惩罚和报复的可能性只是被延后而非被消除。

（二）追随一方，另保核心

与随波逐流不同，中等强国还可以将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加以隐蔽或压缩至最小，以求最大程度降低美国或欧洲对本国的即时不满与惩罚风险。具体表现包括：第一，政治上强烈谴责俄罗斯，力挺乌克兰，甚至以此为契机向俄罗斯施压，谋求在与俄罗斯的其他矛盾和争端中占据舆论优势，同时向西方国家展示“忠诚”。第二，经济上全面参与制裁俄罗斯，造成强大的政策声势，在本国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中付出一定的成本，证实该国的政治立场。第三，在核心领域中延续与俄罗斯的合作，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通过“暂停+恢复”“降低+提升”等政策措施，在特定时段内稳住西方国家的激烈情绪，并尽量隐蔽自身收益。

此种政策的可行性基础有三：一是此类国家与俄罗斯的总体政治经济依赖关系不强。无论其在非核心领域如何制裁俄罗斯，政策效果对本国的经济、社会造成的震荡十分有限。如此，参与制裁甚至主动扩大制裁在本质上都是对西方国家的一种“顺水人情”。二是此类国家在西方阵营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尤其在安全领域不可替代。即使其与俄罗斯在核心合作领域藕断丝连、“秋波频传”，只要大体上倾向西方，美国或欧洲只能暂且忍耐，以求使其继续扮演好原有角色，为稳定地区、追随西方作出表率。三是此类国家在互动中可以与俄罗斯形成某种政策默契，足以使俄罗斯不计其政治表态与非关键性制裁，以强大的战略理性和长期的能源合作保留对该国的战略抓手。虽然无法通过外交方式直接向俄罗斯表达妥协，但是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与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本身便足以传递关键信息。

此种政策既使西方国家无法过多挑剔，也足以在一定时段内保持此类中等强国在俄核心利益，但仍然需其付出某些代价。一是尽管此类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对本国影响相对有限，但为造成声势，毕竟需要付出一定程度的经济代价和社会成本。这些牺牲相对于国家体量而言也许微乎其微，但对于企业和个体而言却可能是灭顶之灾，由此引发的蝴蝶效应也将在日后有所显现。二是即使俄罗斯对此类国家留有余地心领神会，却也绝不会因此将其视为友邦或忘记其落井下石之举。双方对彼此定位仅限于在特定领域互相利用、各取所需，整体关系仍将下降。一旦未来在其他问题上爆发冲突，俄罗斯仍会把此类国家视为敌对力量。三是此类国家对西方的“阳奉阴违”是一种高度复杂和微妙的政策操作，其执行层人员未必具备如此“智慧”，可能会以或“过”或“不及”的方式，过度刺激俄罗斯或过分怠慢西方，国家政策失衡的风险始终存在。

（三）局内偏私，局外弥补

中等强国还可以采用超出俄乌冲突本身的战略布局，最大程度降低俄乌冲突对本国的消极影响并借机扩增本国利益。具体包括：第一，坚定保持战略自主，谨守中立，降低自身因外交“站队”所产生的战略风险。第二，在俄乌冲突中为俄罗斯提供实质性帮助，既不中止与俄罗斯的全方位合作，甚至在关键领域扩大合作范围、加深合作程度，也不对乌克兰加以援助，以致客观上起到了缓解俄罗斯压力的效果。第三，在美国和欧洲的其他重要战略关注上大力提供帮助，在与本国利益一致的方向上紧密配合西方的全球布局，使美欧一方在现阶段无法因

其在俄乌冲突中的负面表现对其施加报复惩罚或降低扶持力度，并与之形成战略交易默契。

此种政策的可行性基础有三：一是此类国家独立自主的战略意识和历史传统较强，且具备成为多极化国际格局中“一极”的实力或潜力，宣布“中立”既可获得国内各方支持，也不会在国际社会中显得过于突兀，反之，则反而有可能引发内外心理失衡与环境动荡。二是此类国家与俄罗斯的整体利益捆绑过强，“象征性制裁”的风险过大、收益过小，继续稳定与俄罗斯的经济甚至安全关系也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其战略自主的地位和能力。三是此类国家与美欧在遏制中国、地区治理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问题上存在利益重合，且已经使美国或欧洲在扶持该国发展的进程中投入巨大成本。如果西方因其实质性援俄政策与之分裂，则前期投入可能沦为沉没成本，后期遏华也将失去重要助力。

此种政策的核心在于立足本国发展，赢得战略主动，最大限度利用俄乌冲突中双方的战略平衡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相较于前两种政策思路更为主动和独立。但是，这种没有“就事论事”基础的跨关系“交易”能否成立的主动权却不被此类国家掌握。目前，全球尚未出现能够在实质上为美国开辟一条独立遏华战线的国家。这说明，此类中等强国对美国的利用价值尚未“变现”，与西方的互信关系也在建构的过程之中，而其在俄乌冲突中对俄罗斯的实质性“援助”与对乌克兰保持外交距离的表现却是即时可见。随着俄乌冲突迁延日久且更见白热化，对于精疲力竭的西方而言，任何在客观上对俄罗斯提供支持的国家都更不再具有身份的模糊性空间，将被视为敌对一方，而此类中等强国对中国的遏制作用则遥不可及，在其他全球问题上对西方的合作与支持相较于赢得俄乌冲突胜利的成果则过于单薄。两相对比，此类国家对西方的战略可信度自然下降，其战略自主可能逐渐成为美国霸权的隐忧，并为其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以及与美国盟友的多边关系埋下隐患。同时，只要俄乌冲突仍在继续，美国便迟迟无法完全实现战略东移，更无力过多扶持中国的竞争对手，此类国家遏制中国的战略价值与相关能力也可能因之下降。

二 中等强国对外政策的经验考察

奥地利、日本、印度三国分别在欧洲、东亚和南亚实践了上述三种对外政策，且在短期内基本实现了保护利益、维系关系、坚持自主等目标。对此类政策

实践过程和结果的考察有利于印证中等强国处理冲突中大国关系的基本政策思路，也有利于总结其对外政策的多重影响。

（一）奥地利：政经分离，各行其是

奥地利是欧盟国家中为数不多的非北约军事中立国，在俄乌冲突中，对双方整体采取了较冲突前政策调整力度最小的“无为”政策。

冲突爆发之初，奥地利确实立即采取了与美欧一致的政治立场，在外交、舆论方面与主流西方国家整体保持一致，不仅在冲突爆发后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还在联合国多次谴责和反对俄罗斯的决议中投下赞成票^①。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德米特里·柳宾斯基对此批评道，“奥地利放弃了在乌克兰冲突中的中立政策，并拒绝为可能的解决方案作出贡献”^②。但这种政治表态属于身处欧盟集体压力下的“规定动作”。事实上，俄乌冲突爆发仅一个月，奥地利总理内哈默便成为冲突爆发后第一个访问俄罗斯的欧盟国家领导人，寻求以温和方式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③。

除政治表态之外，奥地利虽未缺席却没有实质性配合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2023年2月和2024年3月，奥地利政府以“采取与其外交地位不符的行动”为由，分别驱逐了四名和两名俄罗斯外交官^④。但是，这六名外交官并不在被欧盟采取“外交和签证措施”的制裁名单上^⑤。因此，此类驱逐不可被视

^① “Joint Statement Condemning Russia’s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https://usun.usmission.gov/joint-statement-condemning-russias-war-of-aggression-against-ukraine/>, 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② “Austria Given Up Neutrality in Ukrainian Conflict, Russian Ambassador to Vienna Says”. <https://tass.com/politics/1701211>, 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③ 《奥地利总理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晤》，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2-04/12/c_1128551056.htm, 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④ “Statement of the Austrian Foreign Ministry on Four Russian Diplomats in Vienna”. <https://www.bmeia.gv.at/en/the-ministry/press/news/2023/02/statement-of-the-austrian-foreign-ministry-on-four-russian-diplomats-in-vienna>; “Statement from the Austr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garding Two Russian Diplomats in Vienna”. <https://www.bmeia.gv.at/en/ministerium/presse/aktuelles/2024/03/statement-from-the-austrian-ministry-of-foreign-affairs-regarding-two-russian-diplomats-in-vienna>, 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⑤ “EU Response to Russia’s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eu-response-ukraine-invasion/>, 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为奥地利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同时，截至 2024 年 2 月 23 日，欧盟已经执行了十三轮对俄制裁措施。这说明，奥地利同意欧盟针对俄罗斯采取集体制裁。但是，奥地利自身对制裁俄罗斯的经济措施落实效果十分有限。2018 年，奥地利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协议，奥地利每年购买 60 亿立方米天然气，并且有效期到 2040 年^①，该协议并未被废除。2023 年 8 月，欧洲议会甚至一度要求对奥地利“藐视欧盟制裁俄罗斯的行为”进行调查，强调“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奥地利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翻了一番。维也纳无视欧盟的制裁政策，继续每天向莫斯科提供超过 2 000 万欧元”^②。奥地利也没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军事训练^③，或谋求加入北约。

这种把政治和经济彼此剥离，在不同领域各行其是的政策选择确实一定程度上使奥地利陷入了两面获咎的局面。但是，在俄欧双方的不满与压力之下，奥地利也确实在短期内基本保住了“欧盟成员国、北约中立国、对俄合作国”等有利地位，维护了核心利益。

（二）日本：大力反俄、不动根本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大盟友，驻有大批美军，在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且近年来较多参与了北约事务^④。这既决定了日本无法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或站在美欧的对立面，也决定了它在美国战略蓝图中不可替代，进而为其有限的自主行动创造了条件。“中等强国虽不愿在大国间作出选择，但又面临被联盟约束或大国胁迫的压力，因而不能表明中立原则，只能通过模糊、拖延与间接的

^① Patricia Cohen, “Why One Country is Struggling to Break away from Russian Gas”. <https://www.nytimes.com/2023/07/31/business/energy-environment/austria-natural-gas-russia.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0 日。

^② “Request for an Investigation into Austria’s Flouting of the EU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E-9-2023-002408_EN.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0 日。

^③ Ralph Janik, “Austrian Neutrality amid Russia’s War on Ukraine”. https://brill.com/view/journals/arjo/26/1/article-p147_6.xml,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0 日。

^④ “Fact Sheet: the 2022 NATO Summit in Madrid”.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29/fact-sheet-the-2022-nato-summit-in-madrid/>; 《北约秘书长出访韩日，韩教授：牵制中国》，http://www.news.cn/mil/2023-01/30/c_1211723089.htm,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0 日。

策略避免大国的政治惩罚。”^①

在认知域，日本的反俄态度坚决且与西方完全保持一致。俄乌冲突爆发后仅第二天，包括日本在内的所谓“民主国家共同体”便共同发声谴责俄罗斯，“支持乌克兰的民主、主权和领土完整”^②。此后，在联合国历次对俄罗斯不利的投票中，日本均持反俄立场。同时，日本还对乌克兰予以舆论声援。冲突爆发后仅四天，岸田文雄首相便与泽连斯基总统举行电话会谈，并强调“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的心与乌克兰国民同在”。3月23日，日本政府甚至邀请泽连斯基在国会发表演讲^③。在物理域，日本参与了西方发起的多轮对俄经济制裁，并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援助。经过两年中数轮加码，日本已在个人资产、金融投资、日用及高科技产品等方面全部对俄采取封锁措施。一向排外的日本甚至持续推进接收乌克兰避难人员入境日本，并批准延长居日乌克兰人的居留资格^④。

但是，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支持暗藏玄机。第一，日本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原本薄弱，且日本制裁俄罗斯的内容多为双方本无紧密联系的产品和交易。截至2023年年底，日本财务省发布有关乌克兰局势的贸易法政令共26条，对俄制裁的商品种类繁多且不断更新，制裁的手段也不仅限于禁止出口与进口。比如，部分贵金属的贸易及相关服务被规定需要获得首相或财务省的许可^⑤。但是，即使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的2021年，日俄贸易总额也不过200亿美元，且45%来自俄罗斯对日本的燃料出口，2023年日俄贸易总额更是跌至100亿美元^⑥。相对日本经济体量而言，俄罗斯除能源贸易外的其他商品贸易，无论体量还是占比均属无足轻重。第二，仅在冲突爆发后5个月，日本便恢复了从俄

① 张耀：《中美战略竞争与亚太中等强国的行为选择——以美国“印太战略”升级为契机》，载《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2期。

② 《韩美日等民主国家共同体声明谴责俄罗斯》，<https://cn.yna.co.kr/view/ACK20220225000100881>，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③ 潘万厉、白如纯：《乌克兰危机升级对日俄关系的影响及其未来走向》，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5期。

④ 《日本与乌克兰同在：针对乌克兰局势的日本政府应对》，https://www.kantei.go.jp/cn/101_kishida/policy/2022/_00003.html，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⑤ 「最近の経済制裁対象者の追加等」，https://www.mof.go.jp/policy/international_policy/gaitame_kawase/gaitame/economic_sanctions/recent.html，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⑥ Michael Corbin, “The Complete Falling out of Russian – Japanese Relations”.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japan-russia/>，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罗斯进口石油，且购买价格高于美国规定的 60 美元/桶^①。2023 年 5 月，俄罗斯驻札幌市总领事谢尔盖·马林表示，到 2026 年日本每年将增加 200 万吨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②。同时，日俄能源合作从未中止，日本萨哈林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公司拥有“萨哈林-1”项目 30% 的股份，三井和三菱分别保留了“萨哈林-2”项目 12.5% 和 10% 的股份，由三井和日本金属与能源安全组织组成的财团拥有“北极 LNG-2”项目 10% 的股份^③。第三，在冲突爆发一年的时间里，日本援助乌克兰的力度与其综合国力以及对俄强硬立场始终处于失配状态。作为世界级经济体，日本援助乌克兰的资金投入甚至不及挪威，且相关军事援助所占比重几乎可以忽略^④。2023 年，日本甚至出现了议员“擅自”访俄并表达“对俄罗斯胜利充满信心”等事件^⑤，这已几乎触及了美国维护反俄“统一战线”的底线^⑥。

整体来看，日本将自身利益掩藏于“国际道义”之后，事实上采取了“等待—观望”策略^⑦。日本在维持较低政治风险较低和较小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不仅保护了本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核心利益，甚至还利用俄乌冲突向俄罗斯施

① “Japan Breaks with US Allies, Buys Russia Oil at Price above Cap”. <https://www.wsj.com/articles/japan-breaks-with-us-allies-buys-russian-oil-at-prices-above-cap-1395accb>, 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② 《日本将增加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进口》，<https://news.cnpc.com.cn/system/2023/05/17/030101732.shtml>, 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③ 《日本批准日企为“北极 LNG-2”、“萨哈林 1 号”及“萨哈林 2 号”项目提供建设工程服务》，<https://www.chinca.org/cica/info/23071408230111>, 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④ “Foreign Support to Ukraine: Evidence from a Database of Military, Financial, and Humanitarian Aid”. <https://cepr.org/voxeu/columns/foreign-support-ukraine-evidence-database-military-financial-and-humanitarian-aid>. “Ukraine Aid from US in Doubt after Failed Senate Vote”,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67637679>, 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⑤ “Pro-Moscow Japanese Lawmaker Muneo Suzuki Visits Russia”.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3/10/03/japan/politics/japan-lawmaker-russia-visit/>, 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⑥ “Japan Buys Russian Oil above 60 \$ - A Barrel Cap, Breaking with US Allies: Report”. <https://www.foxbusiness.com/markets/japan-buys-russian-oil-above-60-barrel-cap-breaking-us-allies-report>, 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⑦ Wang Shan, “Measures and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Japan to Deal with Russia - Ukraine Crisi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2, No. 5, p. 79.

压，谋求在北方四岛等传统问题上迫俄让步，同时也为国内增加军费、促成修宪营造了舆论氛围^①。

（三）印度：援俄却乌，另作补偿

近年来，印度发展十分迅猛。莫迪政府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经济至上主义相结合，又得到了美国印太战略、产业链转移等外部支持，一心谋求成为全球性大国。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包括扩大安全势力范围、领导“全球南方”、建成制造业大国等内容，全都指向与中国的结构性矛盾，这使其在无形中占据了西方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位置。

在俄乌冲突期间，作为与俄美双方均关系匪浅的地区大国，印度的中立表态与实际行动明显不符。一方面，印度官方宣布对冲突双方保持中立^②，既没有在联合国等国际机制中提出有利于改善俄罗斯舆论环境和国际形象的议案，也不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谴责俄罗斯；既没有提出具有实质意义的和平方案以求为缓和俄乌冲突提供契机，也没有煽动战斗双方进一步激化矛盾。另一方面，印度实际上却采取了明显有利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继续推进战前与俄罗斯的传统能源合作。面对西方经济制裁，俄罗斯对石油创收的依赖性增强。在此背景下，“2022年前3个月（涵盖俄乌冲突爆发后的一个月），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已达到66万吨，该数字接近2021年全年从俄进口量的五分之一”，“而截至2022年5月底，印度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已经达到了505万吨，是2021年全年从俄进口原油量的一倍多。仅2022年6月一个月，印度从俄进口的原油量就达到了390万吨。”^③2023年5月，俄罗斯在印度石油进口中的份额首次超过40%，并且超过紧随其后的三大供应国伊拉克、沙特和阿联酋的总和^④。第二，延续战前与俄罗斯在防务层面的紧密合作。2023年4月，在俄乌冲突长期化趋势已经明朗的背景下，印俄两国防长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

① 陈梦莉：《利益平衡与角色转变：日美同盟视角下的日本对俄外交》，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6期。

② 《印度为何对俄乌冲突持中立立场》，<https://cn.wsj.com/articles/印度為何對俄烏衝突持中立立場-121651041658>，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③ 罗苹、梁淋渊：《俄乌冲突背景下印俄能源合作的现状、挑战与前景》，载《南亚研究季刊》2022年第3期。

④ 《俄罗斯占印度石油进口份额突破40%》，<https://sputniknews.cn/20230715/1051818887.html>，访问时间：2024年4月10日。

长会议期间举行会谈，同意继续加强防务伙伴关系。印度表示，希望俄罗斯不会因俄乌冲突的压力而减少对印武器出口^①。2023 年 12 月，印度又与俄罗斯讨论了军事技术合作的前景，包括联合生产现代武器^②。第三，消极对待乌克兰。2022 年 4 月，印度拒绝日本航空自卫队飞机在孟买降落，迫使日本改变援乌物资飞行计划^③。2023 年 9 月，印度在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期间，拒绝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人参加峰会^④。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印度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说法极不严谨，疑似为美国对俄心理战的组成部分。此论源自彭博社《印度将确保不违反对俄罗斯石油采购的制裁规定》一文，该文确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印度不会破坏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文章同时指出，“印度官员没有公开表示他们将支持七国集团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和价格上限”^⑤。俄罗斯官方也随即表示，“印度向俄罗斯购买石油的价格是商业秘密，关于印度疑似同意遵守对俄罗斯石油限价的说法并不真实”^⑥。

综合观之，印度似乎认为，在俄乌冲突中助俄政策的“副作用”可以被助美反华对冲^⑦。换言之，印度平衡术的理想状态是执行“俄乌冲突中亲俄 + 中美竞争中亲美”，并使美国接受这种双边关系置换，理解、接受并继续拉拢、扶持印度。因此，在俄乌冲突期间，印度对中国的态度持续恶化，对华政策也不断趋

① “India, Russia Agree to Boost Longstanding Defence Tie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india-russia-reiterate-commitment-towards-defence-partnership-govt-statement-2023-04-28/>,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0 日。

② 《俄外长：俄印两国在军事技术合作和联合武器生产方面取得进展》，<https://sputniknews.cn/20231227/1055993342.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0 日。

③ 《印拒日军机入境提取援乌物资》，http://www.news.cn/mil/2022-04/29/c_1211642448.htm,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0 日。

④ “India Confirms Ukraine wil not Take Part in G20 Summit”. <https://efe.com/en/latest-news/india-confirms-ukraine-will-not-take-part-in-g20-summit/>,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0 日。

⑤ “India to Ensure No Breach on Russia Oil Purchase Sanction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3-12/india-to-ensure-no-breach-on-russia-oil-purchase-sanctions>,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0 日。

⑥ “Russian Ambassador Denies Reports Claiming India Agrees to G7 Price Cap”. <https://sputniknews.in/20230316/russian-ambassador-denies-reports-claiming-india-agrees-to-g7-price-cap-1184305.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0 日。

⑦ 张力：《印度在大国博弈中的选择与对外战略特点：俄乌冲突的视角》，载《南亚研究季刊》2022 年第 4 期。

向竞争对抗。“印度逐渐放弃不结盟外交传统，在‘多向结盟’基础上联美制华态势日益明显。印度对华政策的投机性、冒险性突出，对华合作的政治意愿及内在动力均呈递减。”^① 尤其在经济领域，“印度经贸战略调整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试图依托‘印太战略’联合制衡中国经济影响力，限制打压中资企业以扶持本土制造业崛起，把握中美战略竞争机遇期以摆脱对华经济依赖。在印度经贸战略调整的影响下，中国外部经济安全压力显著上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风险，中资企业在印度营商环境不断恶化。”^②

这种带有交易色彩的宏观政策似乎收到了预期效果。“2022年4月14日，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美国正区别对待印度和中国不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的立场，美国也表示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决定并没有违反美国倡导的对俄制裁行动。2022年6月2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表示理解印度立场，强调美国重视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是一个主权决定。与此同时，对于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则表示安全关切。”^③ 这种对比本身便说明，尽管美国可能对印度心存不满，但考虑到本阶段战略大局，对于有可能争取和稳定的对象仍然有意保持了理性克制态度，印度基本实现了交易目的。

三 中等强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评估

在俄乌冲突中，中等强国基于各自国情，普遍采取了“稳住对俄能源合作，降低美欧猜疑不满”的政策思路。此类国家数量增加且相关经验日渐丰富，这将对本国、冲突双方、建设性影响施加国以及国际社会均产生多重影响。

（一）中等强国可能面临内部利益集团分化，外部信任危机加剧

无论中等强国如何勉力维系冲突前的关系格局，主观趋稳取向与现实剧烈变化之间在客观上确实存在矛盾张力，这有可能造成其国内不同社会力量之间、政策部门之间与决策群体之间的分化对立。与冲突双方存在重要利益依赖关系的企

^① 蓝建学：《中印关系嬗变及出路》，载《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3期。

^② 王凯：《中美竞争下印度经贸战略动向及对中国的影响》，载《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第4期。

^③ 谢超：《印度应对俄乌冲突的策略演变及对印美关系的影响》，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年第6期。

业、媒体、民间团体，寻求稳定国内正常运行的经济、文化部门，执政风格保守、“人设”偏好稳健的高级政客可能主张维持既定政策不变；而主要依赖冲突一方的社会力量，谋求突出本部门重要性的强力、外事部门，寻机宣扬意识形态主张的政治人物则可能更有在冲突中“见机行事”的主观能动性。尽管前者往往因基础雄厚占据上风，但后者则势必在前者的压制下形成一股强大的内部离心力。

此外，俄乌冲突终有“中止”或“终止”之时，无论放任自流、阳奉阴违还是大搞交易，中等强国均有因“两面通吃”而“两面得咎”的风险。长期来看，这些中等强国无疑会使自身处于一种战略上的尴尬境地——既不足以从战败或劣势一方分得冲突红利，也不足以从战胜或优势一方赢得信任。这会使中等强国在与大国的关系和战略互动中处于被动地位，并在后冲突时期无形之中付出巨大的信任重塑成本。

（二）冲突双方的大国可能“决斗”倾向上升，在战后国际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

中等强国的自主政策同时向美国与俄罗斯传递了明确信号——利用中间地带国家向彼此施压的成本极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以外的国家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军事装备、社会文化上普遍选边站队，追随顺从。但是，经过近半个世纪冷战的洗礼以及冷战后三十余年全球化进程的塑造，中小国家对于战争与和平、增长与发展均已形成深刻认识和既定路线，它们对大国的意图、底线、软肋洞若观火，这使其作为“棋子”的性价比锐减。俄乌冲突中奥地利、日本、印度等国的表现虽然在战略上各有代价，却也体现了这些国家在具体领域和问题上自行其是的底气。因此，俄乌冲突进入“下半场”后，作为实际冲突双方的美欧与俄罗斯可能会主要依靠发动自身力量进行中世纪骑士式的“决斗”，而非利用多条战线向对手发起成本强加。

这种趋势决定了冲突的成本更多由战斗发生国和以破坏性方式影响冲突进程的影响施加国承担。一旦触及本国核心利益，唯有胜利可以实现国内团结和维持国际威望，冲突烈度有可能在决胜阶段陡升。有观点认为，如果特朗普在 2024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俄乌冲突可能迅速弱化乃至终结^①。这明显低估了美

^① “Zelenskyy Calls Trump’s Rhetoric about Ukraine’s War with Russia ‘Very Dangerous’”. <https://www.cnn.com/2024/01/20/zelenskyy-calls-trumps-rhetoric-about-ukraines-war-with-russia-very-dangerous.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0 日。

国作为全球霸权的战略惯性，也明显高估了某位特定美国总统对于国内军工复合体、欧洲盟友以及和平方案的控制与塑造能力。因此，经过“决斗”式剧烈消耗，俄罗斯、美国、欧洲等主要力量中心在国际结构中的地位可能下降，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战略自主进程将被迫趋缓，“全球南方”国家将在国际事务中掌握更多话语权，全球经济发展重心进一步向相对稳定的亚太地区倾斜，南北力量格局进一步趋于平衡。

（三）国际社会复杂系统效应增强，建设性影响施加国劝和促谈难度上升

在技术革命、相互依赖、冲突演进的背景下，国际体系的复杂性不断加深，“它缺乏对称性、可添加性和可复制性，难以论证因果关系，输入和输出难以对称，整体也等于各部分的总和”^①。“蝴蝶效应”在因果非线性对称的系统作用下使国际政治现象日益无法用事件简单叠加的视角进行认知。“所谓非线性则是指事物变化的非规则性，突发性、不可预料和非对称性，小原因可能导致大结果”^②。因此，中等强国的对外政策越复杂，结构不可约束、作用相互激荡、理性无能为力的复杂系统输入端要素也相应越多，国际体系要恢复原有格局和运行规则的难度也将越大。问题在于，此类复杂性的增加是一种消极演进方向，因为它并非以科学理性主导，也无国际社会在基本共识之上的长期规划。同时，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竞争恢复均衡稳定状态的动力之一是国家间的学习、模仿造成的国家行为趋同化和国际关系社会化^③。中等强国的对外政策虽有普遍思路，却无同一模式，无法彼此效仿，这给国际社会恢复稳态增加了新的难度。

中等强国的政策复杂性不利于地区秩序的稳定，也不利于谋求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大国抓住其当下行为逻辑的主线或预测其下一步行动。它们的不同角色给第三方的劝和促谈工作造成了多重挑战：作为没有直接进入战场却直接或间接表达态度的“观众”，它们使冲突双方无法忽视强大的声誉压力轻易妥协退让，以避免在其他问题上丧失话语权；作为有能力影响冲突进程并已经造成一定混乱政策

^① 王帆：《新开局——复杂系统思维与中国外交战略规划》，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② 同上，第21页。

^③ 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238页。

结果的“参与者”，它们自身便是使冲突向纵深演进的催化因素。尽管在现阶段，它们只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尽量避免增加处理政策结果的成本，但这并不能保证其复杂但脆弱的政策设计不会因未来客观环境压迫而转向更为混乱的“反复摇摆”或“急速逆转”。

（四）全球互联“火种”存续，危机背后蕴藏机遇

不可否认，俄乌冲突确实加剧了国际格局的撕裂与全球治理赤字上升，使大国合作日渐艰难，以地缘政治为主的保守主义思潮强势回归。气候问题、供应链治理、网络空间治理、国际货币体系与能源体系稳定的前期合作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被瓦解对冲^①，“战争与和平”向“增长与发展”形成强势挑战。

但是，中等强国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此前三十年全球化路径依赖之稳固坚韧。从更长远的全局发展周期来看，它们没有彻底打破与冲突双方的相互依赖，这为战后全球秩序的良好重建埋下了某种与全球化要求相匹配的积极因素，降低了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的可逆性。“新工业革命在为全球经济增长构筑新动力、促进包容性发展和提升人类社会福祉的同时，也将重塑国家间竞争格局，为后发国家的竞争与赶超提供窗口期。面对新工业革命的冲击，只有坚持开放和多边主义，以多边规则基于公平对等原则进行约束和引导，各国才能共享工业革命的红利，有效应对工业革命的挑战。这决定了未来全球治理变革的主流方向和主导逻辑必然是多边主义，而不是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②所谓多边主义，正是强调各国之间打破阵营划分，互联互通，共建共享，顺应以生产力发展要求为代表的正确历史方向。因此，中等强国在这一阶段对冲突双方的关系维系为下一阶段在多边合作中的发展聚焦保留了微弱但坚韧的政治经济火种。

（责任编辑 聂保诚）

① 黄宇韬：《俄乌冲突对全球治理形成挑战》，载《世界知识》2022 年第 10 期。

② 谢伏瞻：《论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与全球治理变革方向》，载《经济研究》2019 年第 7 期。